

中国奢侈品市场逆势上扬背后

富人阶层虽然人数较少,却在中国快速崛起。容易引发社会关注的,不仅是他们的创富路径,也包括他们的消费方式。富人阶层的消费现状如何?记者近日在北京、广东、浙江、上海等地进行了采访,尝试进行一些粗线条式的勾勒。

中国富人的强劲购买力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国际奢侈品市场出现疲软,中国市场却“逆势上扬”。据世界奢侈品协会统计,截至2009年12月,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达94亿美元,全球占有率27.5%,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在全球奢侈品消费下滑的背景下,中国富人的强劲购买力引人注目。

世界奢侈品协会中国代表处 CEO 欧阳坤认为,在全球奢侈品市场疲软的大背景下,中国消费者对奢侈品消费的热情不减,而且奢侈品消费在中国呈现不断更新换代的发展趋势。预计未来5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将会达到146亿美元,占据全球奢侈品消费额的顶峰。

奢侈品旺销源于富人阶层的崛起。欧阳坤认为,这十年中国内地出现了一批顶级富豪,奢侈品升温佐证了新兴富人阶层的崛起。胡润研究院一份针对中国千万富豪的报告显示,受访富豪中有25%每年花费在100万元以下,57%的富豪每年花费在100万~300万元之间,达300万元以上的富豪占18%。受访富豪最大的消费是奢侈品,这直接导致了国内奢侈品消费市场的火爆。

以豪华汽车为例。据中国进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部长徐迪介绍,在业界,豪华车的概念是单价超过200万元人民币的车型和品牌,常见的包括宾利、法拉利、劳斯莱斯、兰博基尼等七大品牌。金融危机前,豪华车在国内增长幅度很快,几乎翻三番地增长,危机后销量受到一定影响。2009年1月~10月累计销售1000辆,上车牌的750辆,比上年同期下降20%左右。在国外,豪华车的消费者一般年龄都超过50岁,而国内购买者主要是“富二代”和私营业主,普遍年龄偏低。他们付款通常采取一次性刷卡消费,车辆最低价格200多万元,最高超千万元。

在奢侈品云集的杭州大厦,奢侈品的销售业绩近年来都是两位数的增长,2009年达38亿元,奢侈品品牌专区5万平方米,但只要“挤”进来的衣服,在这里开一个火一个。

据杭州大厦常务副总经理童民强介绍,目前全球80%的奢侈品品牌进驻这里,100平方米的“杰尼亚”品牌店面,一年销售额超过7000万元;OMEGA手表,一年的销售额1亿左右;100多万元的手表,刚摆上柜台就卖完了,更贵一点的珠宝也纷纷被抢购。杭州大厦LV柜台的销售业绩在全世界LV单店中排名第一,杭州已成为全国奢侈品销售量的第三大城市。

“国内奢侈品的购买者有着较大的不同,国外购买者大多是演艺界等社会名流,而国内则是大量民众来购买的多。”童民强介绍说。



某老板购买的私人飞机 (资料图片)

“我们卖别墅就像卖白菜一样”

江西一位做实业起家的富翁最喜欢抽的香烟是“熊猫”。不过他的抽烟习惯很特别,每根烟只抽六七口就掐灭,接着重新点燃一根继续抽,如此周而复始。在与记者聊天的一个小时内,桌上的几包烟很快就消失了。这位富翁说,他抽的不是烟,是感觉。

一位广州的富翁向记者描述他的餐桌文化:“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我辈子弟都尝过了,现在就专挑新鲜稀罕的吃。”对于这些富人而言,一顿饭花上几万元是寻常事,这一顿饭的花费相当于一个公务员一年的工资。

国内餐饮业还向富人群众体专门打造了高档的餐饮会所,实行会员制,光是进入这种私密场合就餐,每年就得交上几万元的入会费。比如北京的一些高档消费场所,一张会员卡1万~10万元,不限次数,花光再续。在广州,有的高档会所一桌席最低起价5万元。

记者在东莞采访时,正好碰到一位富翁嫁女,每桌酒席3.8万元,共请了100桌,这场婚礼仅酒席就“吃”掉380万元。

湖南女孩江晴今年30岁,因为嫁给了一个台湾富翁,由一个打工妹摇身一变成为富婆。她对世界名牌如数家珍,“每年花在着装上的费用一般在一二万元,我身上穿的衣服每件至少上万元。”这一件上万元的衣服相当于在广州做司机三个月的收入。

动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购一台豪车,已成为一些富人寻常的消费习惯。购来的豪车的并非只是代步驾驶使用,有的只是为了收藏陈列,或仅是偶尔的场合才使用一下。深圳有一个“富二代”,父母是长春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靠炒股坐庄发家的。他平时基本不工作,一掷千金购豪车成了他的一大爱好。为此,他在豪华别墅前专门修建了一个较大的私家停车场,停放了20多辆世界名车,其中不乏价值一两千万的顶级豪车,多为收藏观赏之用。

在东莞松山湖园区,一个高档楼盘里打着

“营造南中国富人高尚居住区”的广告。这里售卖的别墅动辄每平方米5万~7万元,物业管理费每平方米为4.98元,最贵的一套别墅为850平方米加上1000平方米的大花园,总价3400万元。如此昂贵的别墅,一开盘就被抢购一空,有的买家还一口气购入几套。

售楼小姐对记者说:“我们卖别墅就像卖白菜一样。”但这些别墅大多处于闲置状态,被富人们自嘲为“买别墅养草”。对此一些富人解释说,反正钱放着也是放着,不如置点业留着。在上海,则有“天价豪宅”,每平方米20万元,“天价别墅”,一亿元一栋。在广州南湖等高档住宅区,有的别墅奢华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些顶级别墅卖到了1.6亿元,配上直升机和名车卖。在深圳小梅沙山顶的一处富翁别墅里,一个马桶就值20万元,家中有8个卫生间,这套别墅里仅马桶费用就达160万元。

为何宁愿“买别墅养草”

富人阶层为何如此热衷奢侈品?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营销系卢晓博士认为,选择最强势的奢侈品除了改善生活质量以外,也是中国实业家向外界证明自己实力和能力的一种工具,因为他们从发展的第一天起就承受着社会的很多怀疑。另外,用奢侈品送礼和应酬,对社会交往、促进生意有很大帮助。

宁波一位38岁的富人说:“很多时候我们必须用最好的品牌,要不然外界就会对我们的实力产生怀疑。我们不是国有企业,也不是外资,要让合作伙伴和周围的人看到我们的实力,我们必须开奔驰600去谈生意。”

当地另一位45岁的富人说:“我买国际奢侈品除了自己使用以外,主要是送给我生意上的伙伴,像丝巾、皮带、手表、手提包、钱包,这些物件的国际名牌,就买最知名的,而且价格上的标签一定要保留。”

卢晓认为,对富人来说,目前全社会对他们的社会贡献给予价值认定的渠道并不多,他们也急于表现出一种有别于常人的社会形象,这

是奢侈品成为身份象征的社会基础。有鉴于此,政府应引导富人履行好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公益事业,为富人获得社会认同多提供平台。

富人阶层为何宁愿“买别墅养草”?有关专家认为,这一“怪事”凸显了当前畅通和拓宽投资领域,让民间资本对国内经济发展发挥更大作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当前,应进一步放开一些行业的准入,降低门槛,吸引民间资本进入。

温州是中国内地民间资本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据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统计,目前温州地区活跃的民间流动资本规模达到了7500亿元左右,但是绝大部分还停留在银行领域。目前,温州地区的银行存款余额超过5000亿元,而在2008年年底,这一数据还只有3000多亿元,显示出在金融危机后,温州的大量民间资本回流,但是众多企业主仍处于观望的状态。

周德文分析,目前资金的观望主要是由于前景不明朗,在经历金融危机后,包括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在内的较多企业面临产业升级转型的任务,但大多数企业仍对转型升级没有明确的方向,加上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尽管外需有所好转,但各行业的利润已被大幅压缩,一些行业的利润率已降到2%~3%的低点,企业主继续投入的信心不足。

2009年阳光私募基金第一名、广东新价值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总监罗伟广,结合资本市场近期的表现指出,1月份银行开始控制信贷,股市投资者担心流动性下降,导致股市连续下挫,但国债和企业债指数均大幅回升,表明银行间市场资金充裕,大量资金仍停留在银行间市场而难以找到投资渠道。

当前民间资本投资的一大新动向,就是倾向向实业领域转移。周德文说,值得注意的是,从温州资本的流向看,尽管近年来投资于新兴农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也逐渐成为温州民间资本投资的重点,但由于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前景的不可控性,民间资本更热衷于投资金融领域,随着近年的经济发展,原本属于垄断性较高、利润亦较高的金融行业逐步开放,包括本地银行的改制、信用合作社的改革以及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为民间资本流向提供了新的渠道。

据周德文的估计,目前温州地区资本投资于创业投资、股权投资等金融行业的总量至少达到1000亿元。东莞易事特大型电源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思楙说,在他的10位企业家朋友中,目前已经有4人移民出国,3人退出实业转投资资本市场,只有3人还在继续做制造业。

民间资本倾向投入的另一领域是楼市。上海湖州商会秘书长周迪宇告诉记者,由于主业形势不好,2009年上到上海炒地、炒楼的浙江民企老板增加,炒房者以使用自有资金居多,也有部分人采用民间借贷的方式集资用于首付,但均利用银行的高杠杆率来实现“四两拨千斤”。他介绍,很多民企老板认为,人民币对外要升值,对内是通胀,企业的经济效益一时也不会有明显改善,现在一线城市卖房套现后的资金向内地的房地产市场转移,尤其是江西、广西、四川等地的三线城市流入更多。周迪宇说,经过2009年这一波投资热潮,

很多民企老板的思想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做实业太辛苦,炒地产来钱快”。

做慈善的渠道有限

在中国内地,富人投身社会慈善的氛围尚未形成。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三大奢侈品消费市场之一;另一方面,富人阶层每年对慈善事业的捐赠比较有限。这一巨大反差凸显社会财富的流向难以消弭贫富差距。

接受记者采访的不同人士反映,近年来,中国财富群体从事慈善活动有所增多,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也在增强,但整体上还是偏弱。胡润研究院去年发布的《2009胡润慈善榜》中,中国共有100位富豪上榜,五年累计捐赠近157亿元。其中有78名富豪入选过《2008胡润百富榜》。这100位富豪平均捐赠额达1.6亿元,占《2008胡润百富榜》富豪平均财富的4%。

胡润说:“汶川大地震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慈善进程,中国企业家的慈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集体提升。但是与《2008胡润百富榜》富豪平均财富相比,民营企业家们发展慈善事业的潜力还很大。”

温州多位企业家告诉记者,许多富人不去做慈善的原因包括:一是不想露富,怕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二是有些富人缺乏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公德意识。三是有些富人想回馈社会,却感觉做慈善的渠道有限。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认为,民间捐赠的使用往往与政府的财政资金混在一起,这种混同导致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功能过强,慈善捐赠最终无法体现民间公益的地位和作用。这既与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大势不符,也抑制了民间慈善力量的生长发育,消减了公益慈善行业的生产力。

卢晓等人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在792位个人资产千万元以上的民营企业家中,对自己的慈善捐助效果感到不透明不太满意的达到64.2%,有9%的受访者很少捐助。

八成受访者认为贫富差距在拉大

2009年,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在浙江省进行了一项“社会关系与社会稳定”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影响社会稳定的三大因素中,“贫富差距”排在第二位,仅次于“腐败”,领先于“社会治安”。课题负责人杨建华告诉记者,1156份有效问卷的统计显示,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达7.5倍,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达6.9倍,都在扩大,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在0.42左右。“全国保守估计在0.46,有的学者估计在0.49。”杨建华说。

一般认为,总体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绝对平均,0.2~0.3之间表示较为合理,0.3~0.5之间表示差距较大,0.5以上说明收入差距相当悬殊。

在上述调查中,包括公务员、企业主、高管、公司职员、农民工、学生在内的八成受访对象认为贫富差距在继续拉大。 据《瞭望》



新闻时评

编辑 陈培营 杨怀锁 电话 67655282 E-mail:szxw@znews.com

“两会大戏”在热播 我们在路上

全国两会开幕在即。每年的3月,中国都会“沸腾”起来。而今年的两会还没开幕就亮点多多,好消息频出,让人充满欣喜和渴盼。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们蓦然发现,公民参政议政意识的爆发力量居然是这般强烈。“两会”,这种政治活动,已经不再仅仅属于“政治”和“官场”,越来越成为普通公民所关注和津津乐道。而前不久,温总理更是“一网情深”地与全国网友展开在线交流,拉开了“两会大戏”走向高潮的序幕。

我们有理由期待,在今年的两会上,国家出台更有力的调控举措,让高房价回归理性。在与网友的沟通中,温总理一句“我也知道蜗居的滋味”,令广大“海藻”们泪流满面!“两会”论民生,“房”事当先!但愿两会上会有更多“炮手”关注房价之高,关注民生之多艰。同时期待这些关注、建议和焦虑,别停留在纸面上,能集思广益并化为现实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们有理由期待,公正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化为现实的充盈。要解决“千多挣少”的问题,要解决利益不均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要解决“国富民穷”的问题……温总理说,“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分好,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也体现政府良知。现在在国民收入分配当中,居民收入的比重比较低”。近几年来,这样的议题不仅是社会共识,也已经成为公共政策改革的重点。可政策的目标和制度的方向,如何平稳着陆,必将成为今年两会乃至更长一段时间里的热门话题。

我们有理由期待,食品安全问题能进一步得到重视。屡被提及的食品安全问题,从未像这几年一样让我们“胆战心惊”,三聚氰胺事件的爆发,“毒奶粉”在2009年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引发了一个民族对于食品安全的追思和拷问。每一次食品安全事故都应带来一些进步,期待两会能在法律法规、行业标准、问责与赔偿等方面实现有效前进的跨越,让成为梦魇一样的食品噩梦离我们远去。

我们有理由期待,反腐倡廉能实现更大的制度创新。温家宝总理去年在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说,“许多网友在网上提出为什么不建立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我认为这个建议是正确的,这应该是反对腐败的一项重大举措。我们说要实行政务公开,也要对官员的财产收入实行公开。”期待今年两会上,“官员财产公开”这一老话题能得到真正的“突破”。

我们有理由期待,还有很多很多,期待一切关乎民生福祉、保障社会的国策与制度。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此时此刻,让我们期待两会,祝福中国,一起分享这一公民社会的盛宴。“两会大戏”正在热播,我们正在成长,我们还在路上。 陈一舟

“被”,深刻而无奈的表达

“被”字以前很平凡,从未有过今天这样的奇妙:被网友们赋予新的含义,被网友们用得神入化。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网络媒体语言分中心、商务印书馆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汉语盘点2009”网络征集年度字、词活动6日揭开真容,“被”和“民生”分列国内字、词第一。

连续四年的“汉语盘点”活动,借助“字”与“词”的形式来评点变化中的本土世界,为我们留下了醒目的文化标记。文化的存在有具体的形式,要件之一是人们创造和运用符号的能力,网友们自觉地创造、自由地运用传神的文字符号,使得我们能够更深刻地了解现实,并传递和储存复杂的文化信息。网友们用一个字、一个词描述2009年的本土情势,仅从语言本身讲,就有难度,加之众人心态上的游移不定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因而难度也更大。“被”和“民生”分列2009年字、词评选第一,反映的是众多网民观察现实的准确性,就其本质说,是无力化解的现实之痛、现实之险、现实之幻、现实之感、现实之念、现实之魔、现实之沉重、现实之无奈、现实之悲、现实之反差,催生出了汉字里的“被”和“民生”。

文字在语言学、社会学中,都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文化符号。通过它,我们文化中的观念、价值观可以找到完整的表达。过去的一年,“被”这样的语言结构方式被网民创造出来,势如野火,生发出大量的汉语新词,“被自杀”、“被就业”、“被加薪”、“被幸福”,等等,它们在表达真切现实的同时,还从多个层面表达了人们的文化观念及价值取向。是“被幸福”这样的语言,增强着我们对现实的某些思维方式。幸福,这是我们在生活中的感觉,而“被幸福”则指向我们不幸的感觉。我们“被幸福”,意味着我们的幸福被少数

有幸福感觉的人代表了。我们很悲剧,悲剧的剧情在于我们的不幸被幸福中的少数人看做了幸福。“被自杀”、“被就业”、“被加薪”等,都可作如此类推。我们“被”怎样了,是一种最悲哀的现实表达,是人心未死,一息尚存的状态。

“被”字结构,与既存的社会结构有关,与“民生”有关,与网民们的存在意识有关。语言以某种方式决定了网民们怎样观察现实,现实又提供了语言表达方式的可能。“被”怎样了,是网民们的内部世界向外部世界发出的信号,是被压抑的潜意识的一部分。网络是个好东西,培养了公众敏感的品质。一个“被”字及其衍生词语,可以说,既表达了公众对于公民权责名实相符的诉求,还表达了“被”怎样或“被”怎样的吁求。“被”怎样了,其心可感,其情可哀,其状可怜,其境可悲。其中,还预示着未来建设公民社会之路的艰苦、艰巨、艰辛、艰难。 今语

民穷催生春运“第四支力量”

往年春运,人们的交通工具无外乎飞机、火车、汽车等,但今年春运期间,出现了一支特殊的队伍。在佛山、东莞、广州等城市,农民工组成摩托车返乡大军。他们骑着摩托车,戴上头盔,披上雨衣,沿着321国道返回广西、贵州、湖南和江西老家过年。而春节后,他们又再次穿着厚实的棉衣,结实的绑腿,或三五结伴,多的甚至上百辆一起在国道上前行。

摩托车的车轮碾压在柏油路和土路上,运载的是民生困感和难题。骑摩托,对一些人来讲,可能是件好玩的事情,可对农民却意味着民生酸楚。奔走上千公里,原本属于极限运动者的特殊爱好,而今却成为数十万农民工回家的交通选择。农民工背井离乡,辛劳一年,春节返乡、节后回程的车费都成难事,折的是一种深刻的民生悲哀。

由社会分层所决定,部分民穷催生了这支数十万之众的摩托大军。春运期间将摩托车作为交通选择的农民工这一事实,使得尽快构建优先考虑弱势群体利益的社会结构、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的诉求,显得更为急切。除了心是热的,长途跋涉遭遇的可以说是一路悲凉。它被人们描述为春运队伍中的“第四支力量”,而这力量却是无奈的力量。可以想见,一路的舟车劳顿,该是多么的艰辛,多么的不易,多么的缺乏安全保障。根据近几年的数字统计,广大农村地区在春运期间,摩托车事故就会剧增,一直到农历正月初月底才趋于平缓,这种长时间的摩托车驾驶,发生事故的频率平时时要大得多。

年年有个春节,年年也就有个春运,今年肇始的春运中的“第四支力量”,会不会成为明年重复一次的现象?从民穷的现实讲,不用猜测也能得出结论,可能的结果是明年的摩托大军会大量增加。在把摩托车作为交通选择的同时,数十万农民工及关心他们的人们对此只能徒唤声声奈何。 伊文



花钱就可成“名牌”

据报道,家电业市场上充斥的诸如“中国著名品牌”、“中国知名品牌”、“世界畅销产品”等奇形怪状的称号,多数是企业花钱从某些协会买来的。 吴之如 文/画

教育改革去行政化 不妨从钱入手

舆论高度关注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近日开始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教育部长袁贵仁表示,纲要中明确指出去逐步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教育行政化是近些年许多学者大加挞伐的教育痼疾。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朱清时眼里,学术界的创新能力在萎缩,根源就是教育体制行政化。他打比方说,改革开放后,包产到户实际上就是“去行政化”,行政权力不再干预农民,使农业焕发了生机;而因为教育没有改革,教育的现状就跟改革之前的农业一样,没有效率,没有创造性。

“大锅饭”之所以效率低,就是因为利益分配与劳动力付出不成正比,因而无法激活劳动者个体的积极性与创造力。而在学校里,利益的天平向行政阶层大大倾斜,势必使得普通教师产生两种想法,要么想尽办法也挤入权力阶层,分一瓢羹,成为既得利益者中的一员;要么产生怠惰心理。相对于行政阶层所得的利益,教学或科研上哪怕有点奖励,差不多还是“千多千少一个样”,又谁会全心投入研究与教育研究呢?

就拿现在各地正在推行的中小学绩效工资来说,很多学校在推行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激发的最大矛盾就是行政人员该拿多少的问题。上海某学校的老师就在网上爆料,说他们学校的“绩效工资”已蜕化为“官效工资”,有权操纵利益分配的人将“班主任”作为起点的参照物,按自己“职务”大小往上“递增”。

把学术机构当成行政机构来管理,自然形成了学校利益分配中的权力金字塔,处在最底层的除了教辅人员,就是一线教师。媒体报道,有的学校工作20年的一线教师的绩效工资,居然还不如20多岁的团委书记,有的学校的年终绩效工资,行政人员高出一线教师10倍之多。

袁部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到了一些减少、淡化学校内部行政化管理色彩的措施,很专业、很到位,只是始终没有提到“钱”字。在我看来,“逐步”取消行政化管理模式的第一步,不妨俗一点,开始简单一点,让学术卓越、业绩突出的教师拿最高的薪酬。这样,“釜底抽薪”,自然不会出现人人向权力、地位低头的现象了。教师的腰杆挺直了,才能“仰望星空”,才能展望世界。 京文